

无根与诘问

◎ 顾文豪

的地方来到大都市。严格说来，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，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，这种缺失让我感到痛心。”

一如他对于同样从小地方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的“观察”，即充分见出奈保尔对于无根的文化状态的深刻反思。他推崇沃尔科特前所未有地以自己的创造力重新审视“小地方”的文化悲哀感，并将对于无根文化的虚无形态的思省以现代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进而成为“一种直击眼前处境的顿悟”。与其相比，奈保尔就认为自己的作家父亲，在写作中完全沉浸在古老的印度仪式中，对眼前生活的痛苦与环境的变迁视而不见。然而奈保尔也毫不留情地察觉到了沃尔科特的成功之中的某些问题。亦即诗人总是强调自己的肤色，总是将更复杂的文化问题转化为种族问题，那么这种转化，显而易见是因为“他把海岛上那种由于空虚而产生的不快乐带上了种族色彩，从而便于处理掉”。于是，肤色的黝黑，不仅暴露出问题，相反也成为更大问题的遮掩布。

但奈保尔又提醒我们，无根的状态并非只存在于所谓的荒野远地，大城市中同样概莫能外。道地英伦范儿小说《斯通和骑士伙伴》塑造了一位即将面临退休的独居佛罗里达先生。生活按部就班，不时陷入对过往岁月的缅怀。即将退休的他，某日突发奇想，向公司上层提出了一个旨在照顾退休员工的“骑士伙伴”计划。这一建议得到了支持，斯通本人也被调去新部门与同事温珀开展这项计划。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，斯通发现自己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角色。加之老友过世，一切让斯通顿感失望。小说结尾，斯通融入伦敦的人群，“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，把

自己累倒，这样内心的痛苦就不能再折磨他了”。

奈保尔1963年在接受采访时自述，这是一部关注“创造的挫折和岁月的流逝”的作品。当斯通在人流中独行时，他意识到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不重要，“而重要的身体却脆弱不堪，终有一天会腐朽”。这才是“宇宙间的秩序”，虽然他曾竭力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甚至在个人生涯中唯一一次尝试作出对自我生活的主动改善，但到头来仍旧陷入不可逃避的孤单怅惘，因为“这终究不是他的秩序”。

有研究者指出，奈保尔写作《斯通》期间，自己也遭遇了人生的痛苦，“对于自己生活的本质，我无法在我的文学经验中找到任何参照，而这另外一种生活，则是那种在有些人眼中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，他们生活在伦敦，有悠久的历史。”但重要的是，奈保尔没有因此让作品陷落在对于自身感受的爱抚中，从而丧失了宝贵的艺术洞见，而是如高尔基所言“在陈腐的晦暗大海里揭示其悲剧性的幽默”。

而当这种“悲剧性的幽默”从个人生活转进至整个国家的重建，那么其中所蕴含的问题也就更深更大了。《游击队员》里看似煌煌实则拼凑出来的“画眉山庄”、“人民公社”不过是衰败中的衰败。而掩蔽在这些衰败背后的革命者，要不在自己的涂鸦中以白种女人的视角自我崇拜，要不在愤世嫉俗里施行旧帝国余晖的伤悼自怜。而最大的“悲剧性幽默”恰恰来源于曾为民权事业坐过牢，出狱后流亡西方的革命人物罗奇。罗奇因为自己早年的经历而得到西方公司的职位，实质上他的角色至多只有装饰性的公关作用。可虽然自知被利用，他仍旧乐此不疲，因为“做实事”的幻想已然牢牢控制住了他。

“当人人都想战斗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。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，人人都是游击队员。”这些人所谓的“革命”，原来无非是在革命的大词底下，各人开各人的队。奈保尔写出了一个个后殖民时代的困境的梦碎与心灭。

在所有我读过的作家中，奈保尔最善于在多角度的文明视野中观察事物。他不仅如其所言，能够站远几步看到一个事物的各种面相，还能够同时从不同价值世界的体系中，来比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处境中的不同意义。见人所未见，不仅指的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更在于能在别人看到的部分，用另外一种方式发现一些不曾看到的东。

离散与飘零，确实是奈保尔文学创作的一大基点。但这一基点，更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间迫使奈保尔学习和训练一种“观察”方式，一种“诘问”方式。有同样经历的作家并不乏人，但奈保尔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。他的优秀，恰恰来自他对离散与飘零的自觉与警惕，他没有让自己沉溺于书写那些“便于处理”的痛苦。

至于他那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温柔，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《幽暗国度》中一段关于印度马车夫的描写：“一整天，它没载上一个客人，这会儿深更半夜，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。车上点着一盏灯，昏昏黄黄。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，自顾自地吃草。寒风中，车夫身上裹着大衣，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，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。擦完，他拿出一根掸子，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，然后又拿起抹布，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。不到一分钟，他又钻出马车，重新擦拭起来。一整晚，他就这样钻进钻出，擦拭不停。马儿只管低头吃草，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，马车亮晶晶的。”

新书推荐

《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》张泽贤著，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

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。本书将视角投注于作为杰出出版家的巴金，将他自1935年到1949年所主编、编辑或关心、过问过的“现代文学丛书”，精心聚合起来，梳理清晰。全书选择与巴金有关的现代文学丛书16套，这些丛书绝大多数是由巴金当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本书介绍了这些丛书的总体概貌，以及主编或编辑者等。诚如本书作者、沪上著名版本收藏家张泽贤先生所感叹的，“当你站在这一套套的丛书面前，不由自主地会感受到一种由惊讶、困惑、钦佩直至震撼的感觉”。重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丰碑，感受是丰富的。

《迷失的人》(法)阿敏·马卢夫著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这是蒙古文学奖得主，法兰西学院院士、黎巴嫩裔法语作家阿明·马洛芙享誉国际文坛的代表作。小说以黎巴嫩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为背景，细腻刻画“迷惘的一代”的群像。1975年那场混乱的战争，让正处于大学时代的一群年轻人被迫面临人生的抉择。亚当逃到了法国巴黎，二十五年了，他没有回过祖国。一天晚上，亚当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，原来是他青年时代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、也是当年少数选择留下的朋友之一穆拉德已生命垂危，想在生前再见亚当最后一面。亚当回到当年一去不复返的旧地，那个白雪皑皑群山环绕的地中海东岸国家，再次召集起青年时代的挚友，直面和反思那段让每个人迷惘的历史，来回应那些逃避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人生命题：爱情与友谊、理想与妥协、政治、欲望、背叛……

《给孩子的诗》北岛选编，中信出版社出版

北岛亲自甄别、挑选，将自己心目中最适于孩子诵读、领悟的短诗公布于世，“为孩子留下一部作品”，实现诗人长久以来的宿愿。57位不同国别的诗人，101首不同风格的新诗，携带着思想、文学、文明的火种，交给孩子，照亮下一代的阅读空间。新老名家的经典译作，是范文，也是美文。

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传》(英)杰拉德·马丁著，中信出版社出版

全书讲述了马尔克斯孤独的童年经历、贫穷潦倒的青年创作时期、成名之后的文学写作态度，以及时代、社会、整个拉丁美洲给予他的对于家庭、革命、文学的诉求。在近20年深入跟踪研究的过程中，马丁访问了300多位马尔克斯的亲朋好友，其中不乏政界、文学界、评论界名人和领袖，也包括他的批评者。

三个老男人一台戏

◎ 陈增爵



述与描摹并驾齐驱的两重奏，是《芬克勒问题》作者欲借助活色生香的感性，衬托枯涩的思辨。小说的思想力量因此体现。对于一般不甚了解犹太民族历史的读者而言，读这部小说后印象较深的，还是那三个老男人的情色故事。例如：年近九十的利博尔尽管口口声声怀念逝去的妻子玛尔琪，可一旦见到五十年前与自己有过一夜情，如今还保留着斯拉夫式美丽的艾米，他的想象力竟然游走在揣摩艾米的裸体上。又如：时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芬克勒背着妻子泰勒与情人幽会，在街头猎艳招妓。特雷斯洛夫更过分：他在自己的卧床上怀抱着芬克勒妻子泰勒，又欣赏着电视上芬克勒的节目。

霍华德·雅各布森用嘲讽的色彩，涂抹着三个老男人的纵情声色，并非仅仅是暴露男人雄性荷尔蒙之张狂。那是将生活的裙子边缘，撩起一点，撩拨人们喜好窥探之欲望的艺术手段。倘若说《芬克勒问题》欲提纯思

维，那思维似乎就是凸现人在社会生存的孤独感。小说中三个老男人试图用男人的常青友谊，填塞生存孤独感那缝隙。利博尔回顾自己过去的记忆，看到的竟然“全是黑色的蜘蛛”；芬克勒在参与犹太人精英的聚会中，获得的快感却是“凶悍的智力散发出荡妇一般的气息”；特雷斯洛夫感觉自己与那些女性的逢场作戏，有被她的五官割出伤口的可能，自己的行径如同男妓。那吉卜赛算命女预言他将遇到那个叫“尤诺”的女人——犹太女子赫夫齐芭，果然也来到他身边。赫夫齐芭这个名字希伯来语的意思是“你让我喜乐”。赫夫齐芭与他同床共枕后逐渐体悟到：“特雷斯洛夫有一种对抑郁的饥渴，好像自己身上的抑郁太少，要来吸取她身上的抑郁，才能获得满足。”特雷斯洛夫想通过赫夫齐芭，寻找并且使自己获得原本不具有的犹太人身份，以便植入更多的悲伤。小说的这一安排，可能是霍华德·雅各布森追求的画龙点睛。



对我而言，奈保尔与格雷厄姆·格林是两位值得终身阅读的典范性作家。甚至可以说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，这两位作家早已超出文学阅读的界范，而时刻给予我关于这个世界最清明洞达的认识。

我对于奈保尔的最初印象：一位彪悍无匹的作家。对于人类孱弱根性以及复杂世界的揭示方面，奈保尔几乎到了笔随意到的畅快地步。撇弃任何可能的文艺腔，直抵人性与世界的深处。这种抵达，就外在的表现来说，自是雄肆斩截的犀利议论，就内在的根性来说，却是一番温柔绵密的细腻观察。

如果奈保尔的个人书写诚然迥异他者，也正因为自有一套观察方式。就像他在《作家看人》中所强调的，“我这一辈子，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，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”。这种观察，不仅是作为书写者的基本功，好比奈保尔从最初的《米格尔街》的“平面”观察，逐渐学习“退后一步、两步或者三步，看到更多场景”的更为复杂全面的观察技巧，进而它还有一种对“自我”文化身份的探究方式。换句话说，作为一个行走过世界的作家，奈保尔无法“假装自己只了解一个地方”；而作为一个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失落始终保持警惕的个人来说，奈保尔“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，因为我是从很远

都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。读获英语布克奖的小说《芬克勒问题》，看书中的三个老男人，这台戏同样精彩。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这本小说开头场景，就充斥着强烈的戏剧悬念。49岁的特雷斯洛夫在明月高挂的夏夜，漫步伦敦街头，竟然遭遇劫。惊慌失措中他依稀感觉将自己的手机、钱包、手表搜罗一空自己动手的一个女人！她为何要选择自己下手？莫非她把自己误认为是犹太人？特雷斯洛夫不是犹太人，而他有二个犹太人好友芬克勒、利博尔。特雷斯洛夫模样英俊、五官清秀又身材匀称。他在广播制作、艺术节导演助理等职场生涯中，混得风生水起，而且情场得意，居然有两个与他没有夫妻名分的女子先后为他生了二个儿子。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可他至今还是个单身汉，还时不时以布拉德·皮特的替身模样，出现在交际场上。那些与他有过一夜风流的女性，控诉他是毁灭梦想、扼杀希望的精神变态者，但又会被他的深沉阅历迷惑。一个吉卜赛算命女看他手相后，预言他会遇到一个叫“尤诺”的女人，算命女说同时她又看到了“危险”……